

# 毛泽东与中美关系\*

倪世雄

[摘要] 本文着重研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对美思想和决策,叙述他在三个阶段里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历史性贡献:第一阶段(1949年至60年代末),中美处于对抗状态,毛泽东针对美国对华孤立、遏制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第二阶段(60年代末至1972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重大战略决策,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第三阶段(1972年至1976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势头不减,毛泽东继续努力,促进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整个过程中形成的对美主张、方针和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毛泽东与中美关系;对美思想与决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09)04-0037-09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也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打下了历史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细微,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坚毅灵活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对外关系,特别是曲折跌宕的中美关系。毛泽东的对美思路、决策和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着重研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对美思想和决策。就与美国打交道的历史轨道而言,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至60年代末),中美处于对抗状态,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对华孤立、干涉和遏制政策作斗争;第二阶段(60年代末到1972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超常规的战略决策。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结束23年的对抗,开始正常化的历史进程;第三阶段(1972年至1976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势头不减,毛泽东努力促进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冷战开始,美苏对抗,中国一边倒,中美关系紧张对峙。尤其是1950年和1961年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更使中美两国兵戎相见,互为敌人,中美关系打下了浓重的冷战烙印。

即便在这样严重对抗的状况下,毛泽东对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决策仍然是全面客观理性超前的。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西直门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时指出:“中国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的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的关系不好。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sup>[1]</sup>

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直面中美关系的现实,但对中美人民友好、中美关系改善充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05JZD00040]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作者: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满了信心。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和信念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对美方针和政策。

(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主要指美国,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早在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sup>[2](p.61)</sup>的重要论断。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论述了纸老虎的问题,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sup>[2](p.362)</sup>毛泽东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有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从现实看,它还有真的一面,是活老虎、铁老虎。因而应该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一看法成为毛泽东对美思想的立论根据。

(二)“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与方针

毛泽东针对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美国全球战略的新态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和方针,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和平力量,组成反美国国际统一战线。

早在1946年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已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当时“中间地带”意指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众多国家。战后,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美国不仅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而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互相争夺殖民地,矛盾也激化了。他指出:“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sup>[3](p.189)</sup>毛泽东这一看法为日后“两个中间地带”的概念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1963年9月,毛泽东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sup>[2](pp.506-507)</sup>1964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所以讲到中间地带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

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sup>[2](p.508)</sup>同年7月,毛泽东更明确地说:“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sup>[2](p.509)</sup>

“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成为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视第一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国家为“直接同盟军”,视第二中间地带的欧洲、日本、加拿大和大洋洲的西方国家为“间接同盟军”,在此基础上与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三)对美国要学会两手对付两手

这时期,毛泽东处理对美关系的另一重要思想是“美国可怕,又不可怕。”<sup>[2](p.205)</sup>美国是“在铁老虎的形式中包含纸老虎的实质。”<sup>[2](p.206)</sup>因此,在实践中,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学会以两手对付两手。

在坚持斗争的一手的同时,也要准备谈判,甚至签订和平条约。针对中美大使级谈判迟迟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断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也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sup>[4](p.198)</sup>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愿意同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张。他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sup>[2](p.213)</sup>

(四)反对美国染指台湾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指出:“美国在中国大陆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sup>[2](pp.127-128)</sup>可见,台湾问题一开始便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毛泽东对美国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多次明确地阐述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

第一,“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sup>[2](pp.378-379)</sup>

第二,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毛泽东在1959年10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强调:“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sup>[2](p.382)</sup>

第三,“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sup>[2](p.453)</sup>

第四,“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sup>[2](pp.382-383)</sup>

第五,针对美方说的,德国有东德、西德,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毛泽东言简意赅地说明问题的本质区别:“中国问题和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即用波茨坦条约分开的。朝鲜三八线是在波茨坦会议上划定的,后来经过朝鲜战争,由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志愿军同美国人谈判又重新划定了这条线。南越和北越是由日内瓦会议决定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sup>[2](p.381)</sup>

第六,“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

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sup>[2](p.451)</sup>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和主张对日后制订和调整对台政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原则。

(五)把美国人民与美国统治集团区别开来

毛泽东对美思想中很突出的一个观点是要把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中少数敌视中国的人士区别开来,强调两国人民是友好的。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就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sup>[2](p.40)</sup>从延安时期到建国以后,毛泽东这一信念一直没有改变。他高度评价美国人民,指出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195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复信中说:“中国人民懂得,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sup>[2](p.366)</sup>

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朋友时再次提醒说:“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sup>[2](p.575)</sup>

最令人感动的是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开,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带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sup>[5](p.544)</sup>

毛泽东的这一伟大预见和坚定的信念鼓励了中美两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这个日子”。

(六)学美访美超美

这时期,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了解美国。20世纪60年代,他曾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替他到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书籍,其中要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非

常重视向美国学习。毛泽东提过,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100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sup>①</sup>

为此,毛泽东曾多次表达过他想访问美国的愿望。1959年3月初,毛泽东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林波依斯夫妇时说,他虽然上了年纪,但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仍每年畅游长江。然后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提出他想去美国游泳,他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后与其长谈。那天又提及想去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游泳,以及去大峡谷和黄石公园参观。

毛泽东提出不仅要学习美国,访问美国,而且还要超过美国。其思想、视野和气势均是出乎寻常的。最精彩的表述是他在1956年8月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的一段感人肺腑、激动人心的话: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不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一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吨、三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又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

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sup>[5](pp.487-488)</sup>

## 二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争霸的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军事力量骤增,所拥有的战略核武器超过美国。苏联的战略进攻态势不仅使之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而且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此时,美国身临越战,不堪重负,试图解脱。面临共同的咄咄逼人的苏联威胁,中美战略和解的历史时机到来了。

最早的和解信号来自尼克松总统在1967年10月号《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文章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承担不起永远把中国排斥在各国的大家庭之外。<sup>②</sup>尼克松用委婉的口气承认美国当年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失败,并表示希望通过对话打破僵局。尽管这一信号极其微弱和隐晦,但还是被毛泽东捕捉到了。七年后的1974年12月12日,周总理在接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时还说起此事:“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泽东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sup>[6](p.46)</sup>毛泽东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

无独有偶。苏联1968年悍然入侵捷克。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发生后,美国哈佛等大学的一批著名学者就美国的东亚政策和中美关系以备忘录的形式提出了深入的分析和建议。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柯恩、傅高义和帕金斯,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鲍大可等。笔者曾先后与他们谈起这段往事。他们都表示,当时提出这一备忘录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在当时的形势下,美国向中国提出减少敌意,实现和解的政策选择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也符合中国的利益。<sup>③</sup>这一备忘录通过基辛格转交

<sup>①</sup>参见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

<sup>②</sup>参见Richard Nixon.“Asia After the Vietnam war”, Foreign Affairs, Vo. 46, Oct. 1967, P.121。

<sup>③</sup>笔者1980—1981年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曾多次与这几位学者谈及该备忘录。

给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采纳了其中大部分主张和建议。

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第37任总统。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再次发出调整对华政策、改善两国关系的明显信号。1969年3月,中苏发生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更为深刻和深远的战略思考。1969年4月,毛泽东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当时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四位老帅经过四个多月的讨论研究,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这一报告,报告指出,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认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并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sup>①</sup>据孔东梅回忆,1969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及陈毅、叶剑英等老帅多次交换意见,在思想上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sup>②</sup>达成一致。

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观察力和准确的预见性,他运筹帷幄,洞察秋毫。孔东梅在回忆录里写道,王海蓉记得,1969年,有一次毛泽东似乎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sup>③</sup>

之后,中美和解努力的进程尽在毛泽东的掌管和预料之中。最早是1969年7月底、8月初,尼克松总统访问巴基斯坦时,让叶海亚总统传递口信,希望与中国有一条和解的渠道。一年后,情况出现重要突破。1970年10月初,尼克松总统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动情地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说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sup>④</sup>10月下旬,尼克松总统分别接见到纽约参加联合国20周年庆典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他当面请叶海亚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sup>⑤</sup>11月10日,叶海亚总统访问中国。头几天,周恩来与叶海亚总统单独会见了4次,11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叶海亚总统一行。在11月14日进行第五次单独会谈时,周恩来请叶海亚总统向尼克松总统传递重要的口信:台湾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干涉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叶海亚总统商定。12月9日,美方正式获悉中方的这一口信。<sup>⑥</sup>12月18日,毛泽东亲切会见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在近五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就中美关系作了坦率而深刻的表达:“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sup>⑦</sup>

1971年4月上旬,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一石激起千层浪,小球转动了大球。“乒乓外交”突破性地把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sup>⑧</sup>当天,作为一个和解的姿态,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大幅度取消对华贸易禁运。

1971年4月27日,周恩来回复尼克松总统1970年12月16日的口信,确认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如基辛格先生,甚至美国总统本人。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尼克松总统发出欢迎基辛格博士访华的“口信”。7月1日,代号为“马可·波罗”的基辛格秘密访华计划启动,为了转移视线,基辛格先访问了越南、印度。7月8日到达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关键部分——遁身术的表演,揭开了序幕。7月9日—11日,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时间虽短,但意义不凡。两天多时间里,周恩来与他会谈了17个小时。中美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苏美关系、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达成共识。7月16日,

①参见周溢潢:《中美关系风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7页。

②参见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8页。

一份简短的但是使全球震惊的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sup>①</sup>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总统应毛泽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他称之为是“一次谋求和平的旅行”。

尼克松总统的专机于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在机场，动人心弦、举世瞩目的一幕出现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周恩来对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啊！”尼克松总统边握手边说：“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越过一个大洋，越过相互敌对20多年的握手，这表明中美关系从此将揭开新的一页”。<sup>[10](p.5)</sup>

毛泽东在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会见了他和基辛格博士，这次会见把这次历史性访问推向高潮。

尼克松总统在专机上对记者说，他期望同毛泽东和周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因此，毛泽东一开始就对尼克松总统说，“昨天在飞机上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一轻松幽默的开场白，一下子把谈话提到哲学的战略高度，“讲哲学，毛泽东意指中美双方应从战略高度出发考虑问题。”<sup>[6](p.134)</sup>哲学分析贯穿了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整个谈话，为中美关系注入了哲学思想基础。

顺着这一战略思路，在会见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

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同意毛泽东的分析：“美中相互并不构成威胁，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形势。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sup>[10](p.8)</sup>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周恩来致欢迎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互为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尼克松总统在祝酒词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说：“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仍有重大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互相为敌，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很黯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将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sup>②</sup>

尼克松总统在京期间，与周恩来进行了四次会谈，后在上海又进行一次会谈，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广泛而又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台湾问题自然是会谈的焦点。

尽管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以至于在后来中美联合公报的起草过程中，不断出现激烈的争论和曲折反复。然而双方本着务实、坦诚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显示灵活，经过多次修改，字斟句酌，直至2月28日凌晨，最后才定稿，解决了起草联合公报过程中遇到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难题。2月2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周恩来和尼克松总统代表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亦称《上海公报》。

在周恩来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成功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尼克松总统兴奋地说：“我所访问

①参见《人民日报》1971年7月16日。

②参见《人民日报》1972年2月22日。

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sup>①</sup>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它是里程碑,标志中美结束了20多年的隔绝和对抗,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正如尼克松总统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sup>②</sup>

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果,《上海公报》提出了中美共同确定的四个基本原则,即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共处的原则、反对霸权的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原则,这些体现毛泽东对美战略思想的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两国关系今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包含共识与分歧,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富有创新理念和谅解精神的《上海公报》从此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 三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sup>[7](p.1640)</sup>

这之后中美双方的努力都集中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目标上。中国开始注重美国,美国出现了“中国热”,中美之间官方和民间的交往开始启动。两国政府在尚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前提下,由美方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负责双方文教、科技和体育等方面的互访活动。特别有意义的是,1972年4月中国政府赠送两只熊猫给美国,美国回赠了一对犀牛。同月,中国乒乓球队在美国访问了18天,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4月18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代表团,盛赞乒乓交往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美双方还同意积极发展经贸往来,美国政府部分地放宽了对华贸易的限制,1972年双方贸易额增至9590万美元,比前

一年的490万美元,增加了18倍。

这期间,基辛格博士频繁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奔波。1973年2月,基辛格博士第五次访华,2月17日深夜,毛泽东接见了。一开始,当基辛格博士问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我看来还不错吧,现在上帝给我发请柬来了。那天晚上的谈话使基辛格博士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把中美关系解决好,即实现关系正常化。<sup>③</sup>那次谈话的内容广泛而深入,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是:(1)中美之间已经化敌为友。“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敌人啊。……现在,我们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友谊了。”<sup>[11](p.79)</sup>(2)中美双方都不要采取一种近视的政策,即不要做相互不信任的任何事情,不要说假话,也不要阴谋诡计。(3)中美双方应该超越意识形态,按和平共处的原则行事。(4)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如果中美之间要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

在基辛格博士此次访问期间,周恩来多次与他会谈,双方商定两国互设联络处,加速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年3月,两国政府分别任命黄镇大使和布鲁斯大使为两国联络处首任主任。5月,两国联络处开始工作。

1973年9月,基辛格博士改任国务卿,11月他第六次访华,也是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畅谈了三小时。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只要你们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象我们与日本当时做的那样。”基辛格博士表示:“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我们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就断绝与台湾的来往。这里面原因很多,所有的原因都与我们国内的形势有关。我告诉总理我们希望到1976年止,在1976年来完成这个过程。”<sup>[11](pp.209-210)</sup>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尽管两国关系

<sup>①</sup>参见《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sup>②</sup>参见The Memoires of Richard Nixon, Vo. 2, Warner Books, 1978, P.26。

<sup>③</sup>参见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591页。

正常化出现了新的进展,但实际上进展是艰难迟缓的。在国际关系上,美国与苏联搞缓和,防中国一手。毛泽东当时就指出,美国可能踩着中国的肩膀去接近苏联。<sup>①</sup>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脚踏两条船,不愿果断地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2年到1974年两年多时间里,尼克松总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美国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将保证继续履行其对台湾的安全义务。因此,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困难,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在《上海公报》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sup>[12](p.362)</sup>

因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8月8日辞职下台,8月9日福特继任总统。福特总统接任后不久,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在他的政府的议程上,没有比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还重要的事情了。为此,他进一步建议,他将派基辛格博士再度访华。于是,基辛格博士11月再度来到北京,毛泽东授权当时复出后的邓小平会晤基辛格。双方商定: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华。为了具体商议福特总统的访华事宜,基辛格博士于1975年10月19日至23日再次访华。

基辛格博士带来了一份内容空泛的联合公报的草稿,淡化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和任务,反而提出一些航海航空的合作协议,中方加以拒绝。10月21日,毛泽东接见了基辛格夫妇及其随从人员,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也在场。基辛格博士对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却回答:“有一些意义,但不是极其。”<sup>[11](pp.503-504)</sup>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出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重要的是国际形势。一百年以后再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可以放一放。

尽管中方对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突破之前福特总统访华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还是从大局出发,欢迎福特总统来访。福特总统于1975年12月1日到4日如期访华。12月2日毛泽东抱病会见了福特总统及其夫人和女儿。当福

特总统建议中美两国合作反对苏联时,毛泽东没有接受,指出,这只是谈谈而已,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达成之前,在下一年或两年中,“我们之间将不会有重大事情发生。”<sup>[13](p.24)</sup>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福特并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尼克松答应了他都答应,尼克松未答应的他也未答应。毛泽东身患重病,苦口婆心,但仍未能使福特下决心打开局面,福特还是停留在口头上保证致力于关系正常化,而无具体实质的措施和行动。据说,基辛格曾几次提醒福特总统,尼克松总统原来打算在他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福特总统都以时机尚不成熟加以推脱,并表示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政治代价太大。

毛泽东对这一情况的失望可想而知,福特总统访华后,毛泽东又一次失望地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毛泽东是一位无比坚毅的人,他失望但从不绝望。尽管中美关系正常化久拖不决,尽管他意识到他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但他仍然关注中美关系,并作出最后的努力去推动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

1975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抱病亲切接见了尼克松总统的女儿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从除夕晚上11点半谈到1976年元旦午夜12点半左右。朱莉转交了她父亲给毛泽东的信,使朱莉感到惊喜的是,毛泽东用英语慢慢地念出在信上端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毛泽东说:“欢迎尼克松先生到中国来。”会见结束时,还对朱莉·尼克松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sup>[14](pp.363-364)</sup>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将于《上海公报》四周年之际再次访华的公告,顿时引起广泛关注,主要的外国通讯社纷纷要求前往北京采访报道毛泽东和尼克松的第二次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夫妇偕女儿于1976年2月21日来到北京,2月23日—24日,毛泽东在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又一次会见了尼克松,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尼克松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他(毛泽东)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

<sup>①</sup>参见陶文剑:《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世界。……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了无可比拟的作用。”<sup>[15](pp.280-281)</sup>2月24日以后,尼克松总统一行还访问了桂林、广州等地。尼克松总统说:“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中美之间的友谊将像那些巨大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一样茁壮成长!”<sup>[10](p.32)</sup>

尼克松总统是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朋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带着没有等到中美关系建交的遗憾与世长辞。尼克松总统当日发表悼念声明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1972年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和我们两国的利益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了。他不仅对他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给我留下特殊深刻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在1976年2月23日我最后一次会见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sup>[5](pp.594-595)</sup>

两年多以后,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中美最终完成了关系正常化。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了毛泽东的临终遗愿。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谈及中美关系。他说:“总有一天两国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上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

够,就再加嘛。”<sup>[2](p.533)</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中美关系果真实现了正常化。若干年后邓小平深情地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sup>[16](p.172)</sup>

责任编辑:云 尔

#### [参考文献]

- [1] 蔡成善.毛泽东参观日本商品展[J].百年潮,2000,(7).
- [2]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斐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5] 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 [6] 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蓉谈毛泽东外交往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7]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美关系30年[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 [11] [美]威廉·伯尔.基辛格秘录[M].庞伟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
- [12] 徐学祁,周永章编著.毛泽东眼中的美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 [13] 陶文剑.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14] 富力.毛泽东与美国——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轨迹[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 [15] [美]尼克松.领导者[M].尤懿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On Deng Xiaoping's Theory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None of the four "stick-tos" in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is dispensable. They depend on and promote each other. Based on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Deng Xiaoping's series of elucidations of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s the domestic version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theory. People's democracy should be continually expanded, legal system be established,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be promoted and the state machine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be strengthened to realize social stability, solidify party's leadership to ideology and confidently stick to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and never allow foreign countries to interfere into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XIANG Qi-yuan )

**Formation of Five-in-one Overall Arrangement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needs an overall arrangement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scientifically elaborated as "five-in-one" of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ve-in-one" overall arrangement is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veral leadership of CPC, especially HU Jin-tao,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it. ( XIA Dong-min JIN Zhao-hui )

**Th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rovides us a systematic answer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tag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latest formu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w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ism. To stick to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to stick to the basic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 DING Rong-sheng )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ts Power:** There is a watertight logic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Treat its basic frame as a foundation,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oft-power of our country ceaselessly. Only when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has been turned into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way of thinking and norm of behavior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people's value, goal and practice and can be experienced by the mass, can the power of its logic be turned into the real power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IAN Zhi-jian LI Zhi-lian ZHANG Qing-hua)

**Inquiry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Inner-party culture of CPC:** The ruling party's inner-party culture means the package of the value system advocated by the party to realize the goals of struggl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reflected in the formation of stable pattern of behavior. The inner-party culture of CPC is a major cultural value system and behavior habits. A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y culture and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building of the party's ideology, and Marxism, they not onl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have differences,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cross-or affiliation relation exists among them. (WU Gui-han)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Common Wealth:** Since the mid-1980s, the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common wealth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some problems: unclear definition of some important concepts, inadequate proofs for the basic propositions, too much repetitive research, too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 lack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other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research strengths should be integrated, properly divided and orderly advanced. What's more, breakthroughs are required in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common wealth, its application research, its realization mechanism,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others. ( XU Xin-san )

**Mao Zedong and Sino-US Rel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airman Mao Zedong's thinking and policy-making toward the US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and describes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hases: (1) The first phase (1949-1960's). China and the USA were locked in confrontation. Mao Zedong staged a firm but restrained struggle against the U.S. 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 policy toward China; (2) The second phase (1960's-1972).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ao Zedong made a big strategic decision to invite President Nixon to visit China, thus starting the process of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3) The third phase (1972-1976). The normalization continued with momentum. Mao Zedong renewed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All the idea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Mao Zedong put forward in these three phases are compone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 NI Shi-xiong )